第 一 章

延安王家坪，这个神秘又神圣的地方

一、1939 年我在延安“抗大”学习，一个可笑的小事情，胡耀邦同志认识了我，从而使我走进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第一局（作战局）

读者看了我这一节的标题，一定会觉得奇怪，一定会发问：你说你是 1938 年 8 月参加革命的，怎么 1939 年还在延安抗大（注：全称是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呢？

我想很简要地向读者说明几句，辩证法告诉我们，什么事情都有一般性与特殊性，我这段历史是属于特殊性。 1938 年 8 月我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的同志认为我年纪小，即将我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最南端的旬邑县郊区陕北公学（注：简称“陕公”）第 43 队学习。1938 年 12 月，陕公与抗大奉命东渡黄河去敌后前线，当我们行军走到延安时，接到上级的通知，点名将我留下，到党中央组织部报到，到达中央组织部时，我一看共有 8 名少年（男女各 4 名），我们互相认识后，中央组织部有位同志对我们说：“你们年纪太小（我 15 岁），不能到敌后去。”那位同志不听我们的申辩，即将我们 8 个人送到安塞县县郊吊儿沟“陕甘宁边区中学”学习。1939 年 6 月，在“边中”毕业后，又把我 1 个人送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分配，当时教育厅厅长是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有名的周扬同志，他亲自接见了我，并很平易近人地询问我的情况后，说：“你年纪还小，送你到抗大去学习一期吧。”这样，我于1939年 7月，到抗大第二大队 6 队学习，这已是抗大第五期了。

在抗大 6 队学习，每周有军事、政治、文化课。《党的建设》课，是由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胡耀邦同志来讲，每个星期有半天的课，当时我们没有手表，不知道讲几个小时，只知道胡耀邦同志每个星期来上《党的建设》课时，总是在我们早饭后，骑着一匹大洋马（从日军缴获的军用马匹，个头很高）来讲课，到中午饭前，就下课，他骑马走了。

抗大各队的课堂，都是露天的。我们队的课堂就在山下惟一的一块小平地，一张小破桌子是讲台，还有用木棒支架支起来一块小黑板，学员都是坐在地上听课，撑着大腿作笔记。

胡耀邦同志的头脑睿智，学识渊博，讲课不用讲稿，滔滔不绝地讲，既讲原则又举具体例子，并做着各种形象生动的手势，他讲到那章那节，即将标题写在黑板上，他的字写的很好，我们大家都很愿意听他讲课。

胡耀邦同志的烟瘾很大，只第一支烟划火柴，以后就是一支烟接一支地的吸，留在地下的烟蒂很多。当时同学中有好几个吸烟的，有的烟瘾也很大，他们都是吸用粗纸卷的陕北烟叶，又苦又辣。当他们闻到胡耀邦同志吸的纸烟的香味时，馋的很，把烟瘾引上来了，又没有办法。他们发现我坐在第一排，正好就坐在讲桌前面，那几位吸烟的同学在课间休息时，就来求我帮他们去捡烟蒂。我开始不干，说：“我又不吸烟，要我蹲到地下去捡烟蒂多丢人。还怕队领导批评哩！”吸烟的同学们简直是好话说尽了，又向我敬礼，拱双手。我只好答应他们在课间休息时，去捡捡试试看。这样一到课间休息，我就到讲桌旁边去捡烟蒂，然后分给那些吸烟的同学，他们都来“抢”。下课后，他们对我感谢不尽，请我以后每次都去捡烟蒂。我说：“看你们怪可怜的，想

吸好烟又没钱买，我就给你们捡吧，如果队里领导同志要批评我，那我可就说是你们要我干的呀！”他们说：“只要你能帮我们捡烟蒂，队里领导批评时，我们主动认错，决不推卸。”他们每次还给我做一个盛烟蒂的纸盒子。

从此，只要是课间休息或下课后，我就去捡烟蒂。我的行动引起了胡耀邦同志的注意，有次课间休息时，我正在弯腰捡烟蒂，突然听胡耀邦同志喊到：“小鬼（注：当时是对小同志的爱称),你捡烟蒂干什么 ?你吸烟吗 ?”

我抬头一看，正好与他双目相遇，我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站起来说：“我不会吸烟，我这是为烟民服务，有几位吸烟的同学，闻到部长吸香烟的香味，把他们馋的要命，要我帮他们捡烟蒂,解解馋。”

胡耀邦同志笑着说：“你说为烟民服务，这倒新鲜，有意思。告诉你，我的烟瘾很大，总是超过供应的指标，特别是讲课，烟吸的就更多，扔的满地都是烟蒂，你这一捡，就等于打扫卫生。哈哈！这叫一举两得，要得，要得。”

胡耀邦同志看到我那不好意思的窘状，就拍拍我肩膀说：“小鬼，我既是你们的老师，也是你们的同志。休息时我们就是同志关系，随便说说话，这样不挺好吗？”

胡耀邦同志随即问我：“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是湖南湘潭人。”他呵了一声说：“我们还是县挨县的老乡哩。”

胡耀邦同志又问我：“你什么时候到延安来的？家里有些什么人 ?”我说：“1938 年 8 月由我哥哥杨第甫送来参加革命的，还有姐姐张正文、嫂嫂、堂兄等四个人都一起来参加革命的。”

胡耀邦同志一听就笑起来了，说：“呵呀！你们一家子都参加革命了，好，好，好，青年人只有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来，才能真正抗日救国。”他又问我：“你现在政治上进步快不快？”我不好回答，没有吭声。指导员于达康同志在一旁回答说：“杨迪同志在政治上表现很好，现在已是队里的学员兼

文书。”（注：当时抗大各学员队的正副队长、正副指导员是连级干部，文化教员和文书是排级干部）。

胡部长笑着说：“小鬼，你进步很快嘛。”他又问我：“你是民先队员吧？”（注：民先队的全称是“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是中国共产党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大批青年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而将共产主义青年团改称为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以便于吸收广大进步青年参加到革命组织中来。以后取消了民先队，恢复共产主义青年团）。

我回答说：“我在陕北公学学习时，因为年龄小，还不能正式加入民先队，只参加了少年民先队。到陕甘宁边区中学学习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是一名候补党员（注：当时称候补，现称预备）。

胡耀邦同志听后，一愣，问我：“你说什么？你已是候补党员吗？党章规定要年龄 18 岁，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你还不到 16 岁就入了党，提前了两年多，这是怎么回事呀！”

我回答说：“在边区中学学习时，学校领导和班主任，认为我学习成绩好，工作积极，对党有一定认识，和同学们相处得很好，党支部就指定党员注意帮助、教育和培养我，当时我不知道，是以后才知道的。特别是生产开荒时，能够和年龄较大的同学一样劳动，满手都是血泡，也不怕苦，不讲怪话。毕业前，学校党支部就主动发展我加入中国共产党。还告诉我：党组织是秘密的，不能对任何人讲自己已入了党，这是党的纪律。”

我讲出来后，就后悔了，党还是秘密的，我当众讲出来，这可违反了党的纪律。我即迅速说：“胡部长，我犯错误了，违反了党的纪律。”

胡耀邦同志听后哈哈大笑说：“我明白了，你说出自己是候补党员，泄密了，对吗？”我说“是”。他说“党组织现在在机关已公开了，在学校、部队暂时还是秘密的，但实际上也是公开的秘密。队里的同学们都能看得明白，那些是先进分子、积极分

子，同学们会猜到谁是党员。你这小小年纪的学员，就兼当文书了，能要你当干部，一定是党员，这连猜都不要猜。你对我说是党员，这不算泄密，不算违犯纪律。因为我是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就是管党员和干部的。”胡耀邦同志这么一说，我可真松了一口气。队里的政治指导员也向我笑了。

我紧张的心情也就松弛了，大着胆子，调皮地说：“胡部长，我这个候补党员的候补时间与党章也不相同，学校支部书记对我说，因为我的年纪太小，规定我的候补期为两年，到 18 岁时转正，这比党章中规定的候补期最长是一年，还长了一年哩！”

胡耀邦同志听了后，没有直接回答我所说的，而是比较严肃地对我说：“小鬼，你这小小的年纪，参加革命时间很短，就对共产主义、对党的认识进步很快，你要特别注意，千万不要骄傲，要更虚心，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和同志们团结一致，努力学习，共同进步。”

以后，胡耀邦同志每次来上课，休息时我仍然捡烟蒂，胡耀邦同志总要和我说说话，问问这，问问那，我都如实地回答。

1939 年 12 月，有次胡耀邦同志来上课，讲完课后，他对我一个人说：“小杨，我已经了解你的全部情况了，现在党中央军委一局缺人，正要选调几名青年干部去工作。我们经过讨论研究，已决定调你到一局去工作。不久调令就要下来了。”

我听后，感到很突然，也很吃惊，我说：“胡部长，我正在学习，还没有毕业，听说学员都是毕业后才分配工作。”

胡耀邦同志说：“抗大是培养干部的学校，如果工作需要，不毕业也可以分配工作的。这在抗大或陕公是常有的事。调令没有公布以前，你还是好好学习、好好工作。”

他准备上马要走时，笑着对我说：“小鬼，下次我来上课，你就听不到我讲课了。”说完，他骑上马就走了。（30 几年后，即 20 世纪 70 年代，胡耀邦同志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后，复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我姐姐去看他，他还记得我。问我姐姐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那个弟弟现在怎么样?)

我站在课堂的小操场上，目送着胡耀邦同志的背影，直至他向右拐过弯看不到为止。我心中既很高兴，又感到不知所措。但我暗暗下定决心，决不辜负党对我的教育、培养和信任，以坚定的信心走上工作岗位，一定要谦虚谨慎，勤奋努力，向领导和同志们学习、请教。

1940 年刚过了元旦，调令来了，我在队领导和同学们的欢送中，恋恋不舍地告别了抗大 2 大队 6 队。队指导员于达康同志一直送我到清凉山下的延河边，指着前面说：“那就是王家坪，你自己去吧！”我向他敬礼后，说：“指导员，请你放心，我决不会忘记队领导和同学们对我的教育与帮助。”我们挥手分别后，我来到了王家坪党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一局，开始工作。

经过三所学校（陕公、边中、抗大），当学员的生活过去了，新的一页就是这样开始了。我的革命征途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二、王家坪是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所在地，王家坪又是军委、总参的代号名称。还有杨家岭、枣园也是神秘又神圣的地方

王家坪位于延安县城郊东北三华里（1．5 公里),靠近延河东的一条山沟里。山沟口从西面进去。沿两边山麓下，有一小块坡地，进沟约 400 公尺，就是狭窄的山沟。山沟口偏南，有一片桃树和其他的一些树木，夏季延河涨水，急流冲到桃树林，这些树木起着阻滞洪水进沟。在黄土高原上的延安，能有这样一块绿色的地方，是极为迷人和诱人的，人们就称它为“桃园”。王家坪沟口有一口历史悠久的水井，高原是很缺水的，打很深很深的井也难出水，而这口井的水源却取之不尽，据说祖祖辈辈（一直到现在）住在王家坪的人就是靠这口井的水生存。这口井与别处

不同，井口是用花岗石砌成的，上面还加了一个高约 50 公分的方形石墙围着井口。40 年后（1987 年 9 月）我在老伴刘刚的陪伴下，重返日夜怀念的延安。看到王家坪各处都变化了，唯独这口井没有变化，故地重游，睹物生情，使我的思绪回到 20 世纪 40 年代王家坪的容貌。当导游的女青年，向我们背解说词时，我对解说员说："我是 40 年代的王家坪老人，我比你熟悉。我来作解说，你来记，充实与修正你的解说词，好不好？"那位年轻的女解说员笑了，很诚挚地说："老首长，我们是照本背熟的，并不真正了解过去的王家坪，真要请教老前辈了。"说着就拿出笔记本和笔。我笑着说："请不要称呼首长，我现在是一位离休的老人，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就称呼老同志吧！"她也笑了说："老同志，请您老人家讲吧！"我就当起解说员来了。

王家坪住着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的首长，以及总参谋部一局（作战局）和军委办公厅。1940 年 6 月以前住在王家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是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1940 年 6 月，朱德总司令从华北敌后八路军总部回到延安后，即住在王家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王稼祥同志即搬到杨家岭党中央所在地去了。

1940 年以前主持总参谋部工作的是代总参谋长滕代远同志。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后，叶剑英总参谋长从重庆回延安，住在王家坪，主持总参谋部工作。滕代远同志就到黄河以东前线去了。

由于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住在王家坪，王家坪就成为当时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的代号名称。王家坪从外表看，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警卫，但实际警卫很森严，没有证件进不了王家坪，即使进了王家坪也不能到处走动，只能在指定的接待室等待你要找的人，因此，王家坪就显得很神秘和神圣。当时，同志们相遇，问你在哪儿工作，只要回答说：王家坪。他们就不会再向下问了，都知道这是秘密的军事重地。

写延安王家坪，就必须写杨家岭与枣园，这三处地方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都是神秘又神圣的地方。

杨家岭是党中央、毛泽东主席、中央书记处（即等于现在的中央常委）和党中央机关所在地。

杨家岭在延安县城北郊约 3 公里，延河以东的一条山沟，这条山沟比王家坪的山沟要稍宽一些。为了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修建的，有名的中央大礼堂就在山沟的入口处，这座大礼堂在当时的延安就是一项很大的建筑了。但只能是土木结构（当时，延安既没有砖，也没有水泥、钢筋），能坐四百左右人。里面是木板钉的一条一条的坐板。读者们可能已从有的历史电影、电视中看到了礼堂前面和主席台的一部分。

杨家岭就成为当时党中央的代号名称。人们一说在杨家岭，就等于说在党中央机关工作。到杨家岭去，那就是到党中央机关去。

枣园，在延安县城以北偏西约 5 公里的山沟里，这条沟较宽大，有很多沟岔，这儿离县城远一些，较隐蔽，有一片枣树和其他的树木的树林子，人们就称“枣园”。

总参谋部第三局（通信局）即住在这儿。党中央、中央军委通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特区、工委和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各抗日根据地、华南东江纵队、香港特区委。以及重庆党中央代表团，还有与当时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的联系，等等，所有的无线电台通信，都架设在几条沟岔里，统一由住枣园的三局负责。

枣园还住有党中央社会部，是负责指挥地下党工作机关。还有当时苏联共产党（也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共产党的联络组，也住在枣园。

后来，毛泽东主席嫌杨家岭住的人多，又没有散步思考问题的环境（杨家岭没有树林），因此，他就和中央书记处的几位同志，经常住在枣园。这儿有窑洞，窑洞前就是那片枣树林子，很清静，很便于他和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同志，在树林中散步，思考

和商讨军、政大事。一局还为此专门派了一个作战小组住在枣园，为毛泽东主席的办公窑洞挂作战地图，根据新的情况，随时更改地图上的标记。

我还想写几句，王家坪、杨家岭、枣园相互的形态与关系。这三处地方，形成一个长形的三角形。杨家岭在三角形东北的那个点上，王家坪在杨家岭以南，那个短距离直线点上，枣园在三角形西北那个延伸点上。杨家岭到王家坪约二华里（一公里），到枣园约 4 华里（2 公里）。从王家坪到枣园约八至十华里(4至5 公里）。这个长形三角形的三个点，成为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通向各个方向的中央局、中央分局、特委及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的指挥中心。

党中央、中央军委就是在延安这样三个小山沟里，取得了指挥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三、总参谋部组成的简要介绍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很精干，下辖只有 3 个局：

一局是作战局，随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驻王家坪。负责作战、情报、军务、军训、测绘以及机要译电等等工作，差不多包揽了总参谋部大部分的工作。抗战初期一局还负责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和驻在王家坪的所有人员的生活管理工作。

二局是负责截收、破译国民党及其军队的电报。为了保密，将二局安置在距延安以北有 60 公里的安塞县城郊，警卫很森严。延安人谁也不知道有这个机关，更不知道住在哪里了。

三局是负责我党我军的无线电通信联络，驻在延安县城西北郊的枣园。

1941 年后，因一局工作任务太重，又太繁杂，中央军委为使一局能集中精力掌握全国、全军作战和情报等工作，以及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解、掌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决定将军委以及负责一局本身的行政事务性工作的管理科，从一局分出去，成立了军委办公厅，负责军委首长，总参谋长和一局，以及住在王家坪的我军高级领导同志和日本友人的生活保障等事宜。以后又增加对来访问的国际友人，美军观察组的接待工作。

这样极为精干的编制，三个局又分驻较远，就自然地使一局成为行使总参谋部主要工作的职能部门。

写到此处，读者朋友们会对我写“在总参谋部”，就不足以为奇了吧!

当时在中央军委领导下，有总参谋部、总政治部，但没有总后勤部，而设有供给部、卫生部，这是红军时期留下来的传统。供给部、卫生部归总参谋长领导，这样与总参谋部下辖的局不相对称，也使总参谋长直接领导的单位太多。因此，在 1942 年，就成立了作战部，同时成立第四局，负责全军军事训练工作（当时只有第四局的名称，没有设立办公机构），归作战部领导。作战部领导第一、二、三、四局，这样，总参谋长直接领导三个部，即作战部、供给部、卫生部，还有军委办公厅。

现在，我比较具体地将一局（作战局）的编制体制情况写一写，以方便读者对本书中所叙述的历史情况的了解。

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一局，领导只有局长、副局长和政治协理员。1940 年以前，下辖作战科、情报科、训练科、军务科，科以下就是参谋，还有管理科（下面是助理员、管理员），测绘股、文印股。

1941 年，随着八路军、新四军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扩大，一局的工作量也不断增大，因此将负责作战和情报的两个科改为处。作战处，下设：一科，负责掌管华北八路军；二科，负责掌管华中新四军及华南抗日游击队。情报处，下设：日伪军科，负责掌管整个中国战场上日本侵略军和投降日军的伪军（注：投降日军的原国民党军，以及南京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的军队，我

都称为“伪军”）；友、顽军科（注：友军是国民党军抗日的和对我军友好的，凡属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军，称顽军）。军务仍为科，测绘股和文印股合编为测绘、文印科。还成立了政治工作处，政策研究室。

一局的编制非常精干，我 1940 年到一局时，只有 20 多人，以后增加一些干部，最多也只有三、四十人。绝大多数干部是红军时期的，连警卫作战室的战士都是红军，只有少数几名同志是抗日战争开始后，参加革命的，进作战室工作的新干部，只有我和龙桂林同志。

1940 年初，我到一局工作时，一局局长是郭化若同志，政治协理员是肖赤同志。 1941 年夏，郭化若同志调走，由伍修权同志任局长，钟人仿同志、刘志坚同志（负责政治工作）任副局长，以后伍修权同志因病休假期间，边章五同志代理过局长。

总参谋部作战室，修建在王家坪那条山沟里的向阳面的山坡上，是土木结构，所谓的土木结构，并不是用砖块砌的墙，而是用木板夹着，中间倒入黄土打夯，夯砸而成为墙。房屋是用圆木架构，屋顶盖的瓦。

作战室的形状是中间一大间房子，就是作战室。室内墙上挂满了华北、华中、陕甘宁边区和华南东江纵队活动地区的地图，还有全国地图、世界地图，地图一直挂到天花板（不是板，是用纸糊的）上。地图上插满了敌（日军）、伪、友（国民党军）、顽（反共的国民党军）和我军团以上番号的小旗子（日军是黄色、伪军是白色、国民党军是深蓝色、顽军是浅蓝色、我军是红色），我们还用三种颜色（红、蓝、黄）的毛线，区分我、友、敌的分界线。作战室内东侧一排办公桌是负责华中新四军的同志们使用的，西侧一排办公桌是负责华北八路军的同志们使用的。室内北侧横摆着一排桌子是局长、副局长办公桌。军委首长和总参谋长到作战室来开会，也是在这间屋子里。作战室西有一间较小的房间，那是情报处的同志办公室，作战室东还有一间小房间，那是

作战值班室，所有的电话都在值班室内。整个作战室还在后墙夯砌了不很宽的一长条库房（为防盗没有开窗户，是开的天窗），即相当于现在的保密室。内部搭了很多木架子，存放各种文件、地图等用品。

作战室正房的西侧还有一间小偏房，是绘制机密的作战地图用的。作战室正门的下坡有一间小屋，是警卫室，住着红军战士，既要担任警卫，又为作战室送开水（但不准入内）。作战室内的卫生是值班参谋负责打扫，所有在室内办公的同志，都很注意整洁卫生，不准在室内吸烟、吐痰，废纸要拿到室外烧纸炉内烧掉。

王稼祥同志在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时，很关怀作战室的工作，他亲自书写“未经许可，不得擅入”八个大字，贴在作战室进门上。

这是一栋很有历史纪念意义的房子，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一局的同志们就是在这栋很简陋、很小的作战室内，运筹帷幄，研究掌握全国、全军以及整个亚洲和全世界的各方面情况，及时向总参谋长、中央军委提出各种各样的战略、战役方针、政策方面的意见与建议。

我 1987 年 9 月，重返王家坪，很想再看看这栋作战室，可是面貌全非，什么也没有了，原址上建了很多住宅房子。我曾想建议现在的总参谋部作战部能够做个模型，陈列在王家坪旁边的历史博物馆内，可是我想现在的作战部也没有人了解当时的情况，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四、住在王家坪的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的领导同志，以及其他领导人

延安王家坪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情况，就是在延安的我军高级军事领导人大部分都住在王家坪。

据我所知，徐向前同志曾在王家坪住过一段时间，后来因病就住到延安以东桥儿沟延安惟一的一所医院治病去了。

副总参谋长王若飞夫妇与一局测绘科的参谋一同住在王家坪沟里的山坡上朝北的土窑洞。

总政治部副主任陆定一夫妇也和一局作战科的同志一同住在王家坪沟里中部的一个窑洞里。

滕代远代参谋长，在 1941 年 2 月叶剑英同志回延安前，住在王家坪，主持总参谋部的工作，叶剑英参谋长回延安后，滕代远同志即到前方去了。

1940 年 6月朱德总司令回延安后，住在王家坪，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王稼祥同志搬到杨家岭党中央以后，他在王家坪住的窑洞，由许光达同志住了一段时间，许光达同志到前线 120 师任旅长后，他的住处即由总政保卫部长吴溉之同志居住。

皖南事变后，1941 年 2 月，叶剑英参谋长从重庆回到延安住在王家坪，他住在朱总司令的前院的窑洞（只有朱总司令和叶参座两位各住二、三孔石头砌的窑洞，其他领导都是土窑洞）。

1942 年林彪从苏联回国后，也住在王家坪。我们每天看到他到朱总司令和叶参谋长那儿去吃饭。

王家坪还住了一位日本共产党人，名叫野板参三。他是日本共产党驻莫斯科共产主义第三国际的代表。他于 1940 年 4 月从苏联到达延安。当时，野板参三在延安化名冈野进。我们都叫他的化名冈野进。

野板参三在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工作，主要是负责对日本士兵作反战宣传，和被我军俘虏的日军士兵、士官进行教育。他还在当时延安“日本问题研究室”与我国曾在日本留过学的同志合作，定期出版“敌国资料”刊物，他有时化名林哲，在延安的《解放日报》撰写论文。1942 年 6 月由野板参三发起成立“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1942 年 8 月在延安召开了被我军俘虏的日军士兵参加的“日本士兵代表大会”。接着又召开了“在华日

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

1943 年 6 月 10 日，第三国际在莫斯科解散。野板参三即以日本共产党领导人的身份进行活动。我党帮助他选拔我各根据地的日俘，送到延安进入“日本劳动学校”学习，并进行反战宣传，同时宣传八路军的俘虏政策。

野板参三还列席了我党 1945 年 4 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1945 年 9 月，日本投降后，我党将他秘密送回日本。

住在王家坪的还有一些军委领导同志和一局、军委办公厅的领导同志等，就不多写了。

第 二 章

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迫使日本改变了侵略中国的战略方针。一局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党中央适时地制定了新的战略方针

抗日战争是 1937 年 7 月 7 日爆发的，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是从 1938 年 10 月广州、武汉失守后开始的。那时，我刚参加革命（1938 年 8 月）。我是 1940 年初从抗大被调到总参谋部一局（作战局）工作的。这时，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了。因此，我只能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写起，而且相持阶段的前一年多的情况，我只能根据直接领导和老同志向我告知的情况来写。

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长达 6 年半以上的时间，在这样长的时间里，政治上、军事上的情况是极其复杂、多变。在这个时期里，我党既要领导指挥我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战争，同时还要与国民党进行各种各样的复杂斗争与反“磨擦”的作战，以及领导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

结，反对分裂；坚持民主，反对独裁等等方面的政治斗争。

战略相持阶段，在敌后，日本侵略军不断地向我军及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清剿”、“清乡”等等极为残酷的进攻，我党领导我军与广大人民群众展开了极为艰难、困苦的反“扫荡”、反“清剿”、反“清乡”等等的战斗与斗争，长达 6 年多的时间。而国民党蒋介石在战略相持阶段中，一方面企图向日寇妥协投降，一方面企图消灭我党我军，不断挑起向我军的进攻。在这段时期里，就挑起了大的反共高潮达三次之多。我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不断揭露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消灭我党我军，向日寇妥协投降的阴谋，领导与团结全国人民坚持抗日战争，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充满着各种错综复杂斗争的过程。充分显示了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聪睿智慧，在战略上的高瞻远瞩，在政治策略上和战略指导上的高超艺术，总是使我党我军从被动转变为主动。在与日寇斗争中，我军由小不断扩大，由游击队逐渐向正规军转变发展，将敌占区建立为抗日根据地或游击区，使我党我军成为坚持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在与国民党蒋介石的斗争上，我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团结全国人民，牢牢地掌握着战略上的主动权，对蒋介石的反共进攻，总是从险恶中，粉碎蒋介石的阴谋，走出困境取得胜利。

一、略述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情况

1940 年初，我调到王家坪总参谋部一局（作战局）工作时，开始分配到情报科当见习参谋。情报科没有在半山坡上的作战室办公，而是在下面的窑洞内办公。窑洞的墙上挂满了地图，这些军用地图，我是第一次见到，还没有仔细去看看。就听到一位年纪较大的同志。和蔼可亲地对我说：“小同志，你是不是到我们科来工作的杨迪同志？”我回答说：“是。”旁边一位同志即对我

说“这位就是情报科朱军科长。”

我马上立正向朱科长敬了一个军礼，说：“报告朱科长，我叫杨迪，奉命到情报科来报到，请指示。”

朱科长笑呵呵地对我说：“你这个小鬼，还懂得军队的规矩，军人姿态也够标准，就是个儿小了一点。”我当即满脸通红，感到很窘。

朱科长看出了我的窘态，即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我叫朱军，我既是你的领导，又是你的同志，我比你的年龄大十几岁，我又是你的兄长，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一是爱开玩笑，二是有话直说。今天是第一次见面，我就开了一个玩笑，使你发窘，你还很年轻，个儿一定会长高的。”他又说：“我把科里的同志向你介绍，认识认识，今后我们工作、生活在一起，不要有任何拘束，你是我们科的同志中最小的一员，以后有什么问题或不懂的事，问哪位同志都行，直接问我也行。”

从那天起，朱军同志（注：即南京海军指挥学院的老院长，1998 年病故）对我既是首长，又是老师，他亲自手把手地教育我怎么研究情况，怎么识图，怎么干工作，如何看情况报告资料，如何分析情况，如何写情况报告……等等。

朱军科长为了培养教育我，科里开各种情况汇报会，情况研究分析会，等等，都让我参加。

朱军科长在检查我的工作时，看到我只是在看新收到情报材料，他即对我说：“小杨，你看情报材料，如果只看现在的，就不可能了解整个抗日战争情况的来龙去脉。当然你也暂时不必去了解 1937 年‘七七事变’以来的情况，这样时间太长，资料也太多了，你在很短时期内也看不完，吃不透。你可以把 1938 年 10 月广州、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的有关资料好好看看。今年（1940 年）仍是在抗战的相持阶段。这样你就能够更好地理解抗战以来是怎么发展到现在这种情况的。这些资料，科里都有，你可找赵继武同志，我要他帮助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